

# 明初皇室戏曲家朱有燬

赵晓红

—

天潢贵胄 北曲大家

——明初皇室戏曲家朱有燬

朱有燬，明太祖朱元璋第五子周定王朱橚的长子，字诚斋，号全阳子、全阳道人、全阳翁、兰雪轩、老狂生、锦窠道人、梁园客等，谥宪王。明洪武十二年（1379）一月十九日，出生于安徽凤阳。

—

朱有燬禀赋卓异，从小即显示出超群的能力。洪武二十二年（1389），朱有燬刚满十岁，其父朱橚因擅离藩国获罪。朱元璋一面将其父迁往云南边徼之地，以示薄惩，一面下令朱有燬管理周王府的国政大事。从洪武二十二年到二十四年，在长达三年的时间内，尚未成年的朱有燬把王国大事处理得有条不紊。身为祖父的明太祖对他欣赏备至，遂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也就是朱有燬十三岁的时候，册立他为周世子。这种殊荣是其他世子所望尘莫及的，就连后来做了皇帝的堂兄高炽，虽然比他大一岁，但被册立为燕世子比朱有燬还迟了四年。

朱有燬弟兄十五人，多为不肖子弟，只有朱有燬“德善多才”。作为父亲的周定王朱橚对长子朱有燬寄予了殷切的期望，特别重视对他的教育，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专辟东书堂供他读书，并派经学家刘醇做他的老师。刘醇本籍河南南阳，后因元末兵乱，迁到洛阳，最后定居河南祥符。他世代为宦，高祖刘真做过南阳知府，父亲刘光祖做过阳翟县令，这样一位颖敏不群、博物洽闻、工诗善文的老师对朱有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曾在散曲[蟾宫令]中直接表达自己对刘醇的推尊：

想当年长史刘醇，德行文章，高古清纯。四十为官，八十致仕，众所推尊。看晚节菊庄旧隐。发天葩梁苑闲人。掩却衡门，守道修真。闲将那胸内珠玑，酝酿做岭上白云。

可以说，朱有燾的德行文章，除了取决于他先天的禀性外，王府教育及刘醇对他的影响，也是非常重要的。正是由于朱有燾的禀赋卓异，能力超群，洪武二十八年（1395），明太祖朱元璋把朱有燾和秦、晋、燕三世子一同接到宫中（南京），亲自教导和训练他们治国用兵的本领。在南京宫中生活的日子，朱元璋的政治文化思想，深深地烙印在少年朱有燾心上，并影响其终身，这就是政治思想上儒家的“亲亲”观念，文化思想上的崇道、爱佛倾向及对戏曲的痴迷。“亲亲”是封建宗法制度下实施皇权的一条重要原则，它来自儒家伦理与政治结合的思想。“亲亲”主要在于其“孝”“悌”。《孟子·尽心上》曰：“亲亲，仁也”。《孟子·离娄上》曰：“仁之实，事亲是也”。强调血缘纽带是“仁”的一个基础含义，“孝”、“悌”通过血缘从纵横两个方面把氏族关系和等级制度构造起来。“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言，泛爱众，而亲仁——。”把“孝”、“悌”作为“仁”的基础，把“亲亲尊尊”作为“仁”的标准，维护氏族家长传统的等级制度，即儒家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孝”“悌”思想的影响下，朱有燾于建文“靖难”时，能替其父顶罪，使父亲免遭杀害。

为了培养锻炼朱有燾，朱元璋曾于洪武二十八、二十九年先后两次派他出塞击虏。据《明史》卷三记载：“洪武二十九年春二月，燕王棣率师巡大宁，周世子有燾帅师巡北平关隘”。说明朱有燾曾于洪武二十九年春二月出塞北平关隘。又据《明实录》记载：

洪武二十九年春二月己丑朔，辛亥，宁王权言：‘近者骑兵巡塞，见有脱辐遗于道上，意胡兵往来，恐有寇边之患。’上曰：‘胡人多奸，示弱于人，此必设伏以诱我军，若出军追逐，恐堕其计。于是敕今上选精卒壮马抵大宁，全军沿河南觐视胡兵所在，随宜掩击，仍敕周王橚令世子有燾率河南都司精锐，往北平塞口巡逻。

其中“仍敕周王橚令世子有燾——”的“仍敕”二字，实应是再次命周定王朱橚转令朱有燾率师北征的意思，所以洪武二十九春朱有燾是第二次出塞北巡。

那么他的第一次出塞是在何时呢？《明史》还有另一段记载，洪武二十八年春，朱有燾的父亲周定王朱橚和伯父晋王朱棣分率河南、山西诸卫军，出塞筑城屯田，周定王朱橚率总兵官周兴出辽东关塞，朱有燾也参加了此次出塞，这就是朱有燾第一次出塞。据明人郑晓《今言》记载：

“（洪武）廿一年，脱古思帖木耳为其下也速迭所弑，诸酋立坤帖木耳为可汗，而猛哥帖木儿为瓦剌王，是时虏数侵边，魏国公达、宋国公胜、凉国公玉、颍国公友德、西平侯英、成祖、晋王、周世子相继讨虏，虏亦扰我塞下，建文二年，虏中衰乱，其大酋脱列干等乃款塞。三年，坤帖木儿亦遣人款北平”。

可见，塞上患虏，实始于洪武二十一年，而诸王勋臣相继讨虏出塞者，为数众多。但这些人中，最年青和最得志的一个人，却是当时尚为世子的朱有燾，他不仅出巡了北方边塞，而且还率领精锐部队独当一面。一个年仅十七、八岁的青年王子，竟能担当如此重任，也真可说得上是叱咤风云，少年英武了。

祖父朱元璋早于他人封朱有燾为世子，又接到宫中读书；父亲朱橚为他专辟学堂、延请名师；祖父和父亲安排他从军边塞，如此种种，都表明祖父和父亲对他寄予了厚望，希望他能够在政治、军事上大有作为。少年得志的朱有燾本可以按照祖父及父亲的安排，成为一名守卫与开发大明北方疆土的一代名藩，然而，作为明初一位享有盛名的亲王，他并非以一位裂土分封的藩王而彪炳史册，而是他在戏曲史上所取得的引人瞩目的成绩使他名垂青史。朱有燾以其藩王之尊，为什么会走上戏曲创作的道路呢？这当然与其在南京的生活密不可分。

>

二

明朝内廷演戏之风很兴盛，朝廷有教坊司，宫廷内还有“钟鼓司”，由宦官演戏，明后期多演传奇、杂剧及打稻、过锦诸戏，而前期则是以北杂剧为主的。朱元璋于洪武二十八年（1395）将朱有燾与秦、晋、燕三世子一同召到宫中学习，朱有燾在学习之余便经常看戏，长期的耳濡目染培养了他对杂剧的爱好，为他日后创作杂剧打下了基础。据《明实录》记载，在明成祖定都北京前，即永乐十九年（1421）以前，朱有燾经常到南京，多半是去向皇帝明成祖

朝见请安或祝寿，因此到南京后无外乎是庆贺、看戏等，所以在朱有燾的杂剧作品中常常描写庆赏祝寿等歌舞升平的内容，足见南京的生活给朱有燾所带来的重大影响。

另外，明初的皇权政治使朱有燾深深感受到政治斗争的残酷和恐怖。明太祖朱元璋，从出身布衣到夺得天下，受汉高祖刘邦影响很深，并将“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历史教训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从洪武十三年（1380）开始，朱元璋对当年追随他南征北战、东讨西伐的一批宿将及开国以后仍握有重权的老臣，进行了有计划的清除。由于朱元璋实行的是族诛，每杀一臣，就有包括男妇老弱在内的几十甚至上百口无辜弱者被送上断头台。后来，这股滥杀之风竟然殃及朱元璋自己的骨肉，他的建有特殊功劳的两个义子，即亲侄儿朱文正和外甥李文忠也未能幸免。他的第八个儿子、朱有燾的叔叔、潭王梓因其岳父和舅兄坐胡惟庸党，被迫与妻子于妃阖宫自焚而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场政治斗争的残酷到了惨绝人寰、令人发指的地步。朱元璋兴起的滥杀之风夺去了朱有燾数位亲人的性命，成长中的他对政治的残酷有了初步的认识。

朱元璋对功臣滥杀的同时，还效法汉高祖刘邦实行分封制，所不同者是汉高祖是封异姓王，朱元璋采取的是封同姓王的做法。“帝惩守元孤立，失古封建意，于是择名城大郡，预王诸子，待其壮而遣就藩服，外卫边陲，内资夹辅”。朱元璋给儿子们定下的“藩屏帝室”的任务并不轻松，而是有非常繁重的任务和重大的责任。这些藩王们并没有多少自由，朱有燾的父亲就因为擅离职守，从封地偷跑回老家凤阳，激怒了朱元璋，被囚禁在京城，此时，朱有燾才刚满十岁，就被迫料理藩事，这促成了他政治上的早熟，使他明白，身为皇族，行事更应谨慎小心。朱元璋在其“亲亲”思想指导下实行的分封制，即“藩屏帝室”政策，使藩王的军事力量很大，它的直接恶果便是导致了朱棣的“靖难”。

> 如果说朱元璋时期的政治斗争还只限于一种排除异己的封建宗法观，对子女还是手下留情的话。那么，到了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病逝后，一场更为严酷的政治斗争就开始了。

这是一场叔侄兄弟间的骨肉残杀。朱元璋在死前立皇太子继承皇位，世称建文帝，这引起了四子燕王朱棣的不满，而建文帝也感到了叔叔们的虎视眈眈，于

洪武三十一年（1398）七月开始削藩。在建文帝进行“削藩”的同时，蓄意已久的朱棣乘机以“诛奸臣”、“清君侧”为名，率“奉天靖难之师”发动叛乱。朱棣的燕军所向无敌，仅用三年时间就攻克南京，取得了“靖难”的成功。朱棣从亲侄儿的手中夺取了天下，随即粉墨登场，登上了帝位。在这场政治斗争中，朱有燬之父朱橚也被卷入其中。《明史》卷一一六记：“建文初，以橚燕王母弟，颇疑惮之。橚亦时有异谋。长史王翰，数谏不纳，佯狂去。橚次子汝南王有燬告变。帝使李景隆备边，道出汴，猝围王宫。执橚，窜蒙化，诸子并别徙。已，复召还京，锢之。”朱有燬在其父被充军和囚禁期间，到处奔走，四下托人开释父罪，这些行为和他仲弟朱有勳的诬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颇为时人称道，以至朱棣夺得天下后，特意制作“纯孝歌”褒奖他：

朕闻至孝足以动天地感鬼神，匹夫匹妇一念诚切，金石可贯，豚鱼可孚，载之方策，倍不诬也。矧于死生之际，所处尤甚。古今孝子欲代父死者几何人哉？建文用谗者，诬构尔父，逮尔父子至京，备极苦辱。朱有燬不忍父之无辜，遂自承伏言。父不知状，以死自期，略无怖色。建文由是窜尔云南，穷困万状，终无悔辞。兹非能处死生之际，庶几古人之至孝也。

父亲获遣期间，朱有燬曾跟随父亲来到云南蒙化。由一位富贵的藩王世子而遭流落，成为宫廷斗争的受害者，朱有燬心中自然十分沉重。他的《临安即事》诗，足以表现他贬戍云南时的心情：“冻雨寒烟戍满城，雨中烟外更伤情，沙头风静鸳鸯睡，岭上云深孔雀鸣。番城白监徒海出，野田青蔗绕离生；蛮方异俗那堪语，独立高台泪似倾。”然而，真正让他抑郁难伸的恐怕还不是漂泊流离的流放生活，而是骨肉之间为了权利互相倾轧的事实，使他对政治的险恶有了切身的体验。这是一次耐人寻味的战争。其一，无论是建文削藩，还是燕王靖难，造成的都是千百万士兵和百姓人头落地。其二，这次战争实际上是皇室内部的倾轧，因此，这场战争对朱有燬震动很大。除了骨肉相残、血流成河的严酷现实，朱棣兄弟在“靖难”中不同的表现和结局也使朱有燬感慨万千。首先是宁王朱权的遭遇，朱棣曾以“事成平分天下”为诱饵，逼迫朱权参加“靖难”，朱权在燕王军中“时时为燕王草檄”，几乎参加了“靖难”的全过程。然而“靖难”后，朱棣却没有兑现诺言，朱权不仅未得到半壁江山，而

且连自选封地也屡屡不能如愿，最后被封南昌。据《明实录》记载，建文四年（1402）朱棣即位后短短的几个月，给诸王赏赐五、六次，朱权只有一次和其他二十一位亲王一起得过黄金百两，银千两，锭五千，而周、齐、代、岷四王，都是在建文“削夺”中受过打击的，朱棣即位之初就复爵位，还其原来的封国，赏赐十分丰厚。尤其对被建文处分最重的周定王橚，于囚禁中解救出来之后，立赐钞 2100 万锭，不久，又赐生日礼物若干，以后又屡屡给赏，优于诸王。父辈们的不同遭际使朱有燾明白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统治哲学。

永乐元年（1403）正月，朱棣称帝，经历了四年的流浪生活，朱有燾的灾难才算结束，从洪武十二年（1380）朱元璋的杀戮到永乐元年（1403）朱棣称帝，可以说，朱有燾成长的过程，始终伴随着皇族内部的权利争斗，骨肉相残；伴随着文臣武将和许多无辜者的人头落地。耳闻目睹这些宫廷斗争、鲜血淋淋的屠杀，他为之震动，深深感受到政治斗争的残酷和恐怖，不寒而栗，并产生惧怕和厌倦的情绪，痛定思痛，他决定远离政治，开始寻求另一种生活方式。

### 三

正当朱有燾对前途感到迷惘、为以后的生活道路的选择而徘徊不定时，有一个人的经历给了他极大的启发，这个人就是宁献王朱权。

朱权，号涵虚子，是朱元璋的第十七子，这个比朱有燾只大一岁的叔叔，生活的遭遇更为坎坷。他从小自宫中长大，“禀赋特异，高皇帝独钟爱”的“大明奇士”。本来走着与他四兄朱棣大致相同的道路，少年时其王霸才具就已崭露头角，受到父亲朱元璋特殊的青睐，封藩边地要塞大宁，按照父亲的安排，他至少可以成为守卫与开发大明北方疆土的一代名藩。曾被边塞将士们描述为“文庙善战，宁王善谋”，得到“智掠渊宏”的赞誉。然而在朱元璋去世不久，随着朱棣向皇帝宝座进军脚步，朱权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南辕北辙”的变化。

朱棣发动靖难之时，朱权被挟从燕军，并“时时为燕王草檄”，为朱棣登上皇帝宝座立下了汗马功劳，被史学家评论为“无宁安得有燕”。朱棣也曾许诺事成与其中分天下，可是朱棣称帝后，朱权不只未得“半壁江山”，连请封苏州、杭州两个封地也没有要到，最后只能就封南昌，并且朱棣对他是“凡察藩

王动静诸事皆命信”，严密监视。永乐元年（1403），有人向成祖密告朱权有“巫蛊诽谤事”，幸后来“密探无验，得已”。经过此番惊吓，朱权从此大彻大悟，“自是日韬晦，构精庐一区，鼓琴读书其间，终成祖世得无患”。应该说，朱权是皇室斗争中的失败者和牺牲品，但在戏曲创作和研究中，却获得了巨大的成就，留下了《太和正音谱》这一戏曲理论著作，另外，他还创作了十二种杂剧作品，可惜流传下来的只有《冲漠子独步大罗天》和《卓文君私奔相如》，分别为神仙度脱剧和婚姻爱情剧，这也是朱有燬杂剧作品中的主要题材，足见朱权对朱有燬的影响之大之深。

当然朱有燬走上戏曲创作的道路，与家族中喜好戏曲之风也是密不可分的。朱元璋对戏曲的爱好，深深地影响了朱有燬。《涇林续记》记载：朱元璋一次问昆山耆旧周寿谊：“闻昆山腔甚佳，尔亦能讴否？”足见他对戏曲的喜好，他非常重视戏曲的教化作用，评价《琵琶记》说：“高明《琵琶记》如山珍海错，贵富家不可无。”因为爱好戏曲，倡导戏曲发挥教化作用，他曾将大量词曲作品赐予各位亲王，这就是李开先在《张小山小令后序》中记载的：“洪武初年，亲王之国，必以词曲一千七百本赐之。”除了词曲作品，朱元璋还赐给一批被称为“乐人”或“乐舞生”的艺人，既可充作各种仪节之用，也可与皇宫一样，用于娱乐。明成祖朱棣同样喜欢戏曲，可以说甚于乃父，即使在觐觐帝位，蓄谋待发中亦未忘却戏曲的演出，《录鬼簿续编》就记载了贾仲明、汤舜民、杨景贤一批杂剧作家围绕在他的周围。可见朱有燬走上戏曲创作道路，可谓“家学渊源”。

另外，明成祖是以藩王夺取帝位的，他深知太祖制订的藩王拥有兵权的分封制度对皇权的危害，因而即位后，他改变了诸王拥兵藩屏帝位的体制。据《明史稿·诸王传》云：“自是以后，矫枉鉴覆，法网綦密。----藩封之局，日剥月削，虽支子代有封立，而恩泽递降，规制无加。其旧封远者，宗派繁昌，禄秩难给，末胄疏属，不免饥寒。即号称雄藩，而牵于文法，长吏得以束缚之，所谓维城之寄无有也。”成祖以后，宗藩由重兵在握镇守一方的军政大员，下降为坐食禄米、无所作为的皇族地主了。

由于诸王拥兵藩屏帝位的体制已改变，朱有燬政治上的前途不再一片灿烂，惧怕厌倦权利斗争的朱有燬并不为此感到失意、沮丧，反而将精力投入到戏曲等文学创作中，以寄情娱乐。永乐二年（1404），二十六岁时，他写出了最早

的杂剧作品《张天师明断辰钩月》，从此走上了戏曲创作道路。永乐四年（1406）写出《甄月娥春风庆朔堂》，永乐六年（1408）写出《惠禅师三度小桃红》、《神后山秋狝得驹虞》，永乐七年（1409）写出《李亚仙花酒曲江池》，永乐十四年（1416）写出《关云长义勇辞金》。正当朱有燾潜心戏曲创作时，永乐十八年（1420）十月，又有人告发朱橚谋反，“帝察之有验，明年二月召至京，示以所告词”，朱橚“顿首谢死罪”，归献封地、护卫，朱棣才释疑而不复问。这次告密事情虽然有惊无险，但还是使朱有燾心存余悸，从此更加小心翼翼，将精力更多地投入到声色之娱。永乐二十年（1422），他写出《李妙清花里悟真如》。另外，他还创作了《元宫词》一百首和其他一些诗文，于永乐十四年（1416）刊刻了一套极为有名的东书堂集古法帖和一册图文并茂的兰亭楔帖。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宣德帝继位后，朱有燾也由世子继位藩王，此间他还是遭遇了不少的麻烦。主要有其一是与其二弟朱有勳之间的夺子事件。另一是毁塔事件，据无名氏《金梁梦影录》所云：“王藩甚着声誉，朝廷忌之。会有希旨谓开封有王气者，诏毁城南繁塔七层以厌之。”仅仅是有人说开封有王气，皇帝便下诏毁掉“繁塔七层以厌之”，政治的险恶让朱有燾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由是，“王惧，乃溺情声伎自晦云”。

由此可见，朱有燾除了因出身帝王之家而能享有锦衣玉食之外，并未比他人得到更多的心灵自由。他仍然必须言行谨慎，小心从事，否则就会惹来灭顶之灾，甚至殃及妻儿。年老多病的他心力交瘁，进而把人生看透了，青少年时代受祖父影响在头脑中埋下根基的佛道思想此时占据了上风。对他来说，即使贵为王侯，到头来仍不脱黄粱一梦。任何人，不管他是圣贤还是愚痴，其结果总免不了归于黄土。因此，他认为，一个人对于忧患得失，实在不必挂心，在这扰攘的世界里，虚诞的人生中，只有顺从天命，随缘而过，人才会得到快乐和幸福。散曲北调[山坡羊]八首，足以说明他以上的这种思想，现录其中两首如下：

膏粱供奉，寰区知重，浮生自赏皆无用。德尊重，禄盈丰，浑如一枕黄粱梦，迷到老来才自懂。功也是空，名也是空。



人活百岁疏狂一世，谢安携出东山妓。管弦催，洒盈杯，花前醉了重还醉。  
休使心机图  
甚的？花也笑你！人也笑你！

最能代表他晚年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情况的是他的《清江引·题隐居》：

些儿名利争甚的，枉了著筋力。清风荷叶杯，明月芦花被。乾坤静，中心似水。靠蒲团坐观今古书，赓和新诗句。浓煎凤随茶，细割羊头肉，与江湖做些风月主。

由于现实处境和人生观的影响，朱有燬晚年沉浸于戏曲创作中，达到杂剧创作高峰，佳作迭出，有时一年多达七种。宣德四年（1429）作《群仙庆寿蟠桃会》一种，宣德五年（1430）作《洛阳风月牡丹仙》一种，宣德六年（1431）作《天香圃牡丹品》、《美姻缘风月桃源景》二种，宣德七年（1432）作《孟浩然踏雪寻梅》、《瑶池会八仙庆寿》二种，宣德八年（1433）作《紫阳仙三度常椿寿》、《刘盼春守志香囊怨》、《赵贞姬身后团圆梦》、《福禄寿仙官庆会》、《黑旋风仗义疏财》、《豹子和尚自还俗》、《宣平巷刘金儿复落娼》七种，宣德九年（1434）作《十美人庆赏牡丹园》、《清河县继母大贤》、《东华仙三度十长生》三种，宣德十年（1435）作《吕洞宾花月神仙会》一种，直至去世那一年，正统四年（1439）还完成了《河嵩神灵芝庆寿》《南极星度脱海棠仙》两种杂剧。同时，朱有燬还是一位颇具文学素养，有多方面创作才能的艺术家。他一生著述甚富，除杂剧三十一种外，还有诗文集《诚斋录》四卷，《诚斋新录》三卷，《诚斋遗稿》一卷，《诚斋词》一卷，《家训》一卷，散曲集《诚斋乐府》二卷，《诚斋集》三卷。《元宫词》一百首，《牡丹谱》一卷，《周宪王校订西厢记》，《东书堂集古法帖》十卷，《修楔帖序》一卷，《诚斋帖》等。

朱有燬虽贵为藩王，生活条件优越，心理压力却是巨大的，长期生活在政治斗争的恐怖之中，不仅家庭屡遭变故，几于不测，自己也饱受劣弟的攻讦，他不得不处处小心，步步留神。由此，他对人生的富贵感到幻灭，对佛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又由于朝廷赏赐戏曲和乐户，以及家庭和环境的影响，培养出他

对于戏曲的喜好，从而走向创作的道路。他仿佛要逃离这混浊的人世，在神仙佛道之中寻求解脱。然而，他又“日与刘醇、郑义诸词臣剖经析义”，讨论修齐治平的大道理。由此可见，在他思想深处，还是以儒家的忠孝贤明为依归的。从他童年起，这些观念就已根深蒂固，是很难抹掉的。他远离政治，将相当一部分精力投入到词曲和杂剧创作中，是为了“纷纷世事全忘虑，闲居中和太古音”，寓有寄情声色以远祸的意图。可见纵情声伎，对朱有燬来说，不仅是闲暇之余的极好消遣，也是韬光自晦、表明心迹的一种方式，那些看似随意的歌舞剧和佐樽庆寿剧，在极尽奢华之能事的背后都有着一片苦心，是委曲求全，也是无可奈何。这使朱有燬走上了一条独特的刻有明初皇家政治烙印的戏曲创作道路。

>

>

#### 四

朱有燬为人仁厚、诚心向善，也颇值得称道。首先，他对自己的妻妾们爱惜有加，和正妃巩氏伉俪情深，巩氏阁前开一株并蒂的牡丹花，朱有燬特制[南吕一枝花]赞之，并在序中说：“宣德七年，三月十一日，正妃阁前牡丹开二枝，合欢其萼，众皆称赏。予以妃内助之贤，合为一千，此非人力所可致也，且予后圃牡丹，何啻千余，皆未尝作双花者，惟妃阁前后，但数本，连岁着花皆双，是由人之和气，感召草木，乃得春阳和气之钟秀也。”他最喜爱的宫女夏云英去世，他在万分痛苦之际，亲自为其做墓志铭一篇，称其“明白道理，有贤明妇人之风”。甚至对宫中的侍女们也非常关心，在他病重时，还上书朝廷请求在他身后下诏免掉夫死妻殉的这件人间惨事，并且让那些在他府中年少有父母的宫女们，回她们自己的家，被后人认为“英宗皇帝之除殉葬，概本于宪王有燬之奏也”。足见朱有燬的宅心仁厚。

其次，他善待他人。府中之人，凡与他交往过的，他都关心倍至，如周纪善要告老回乡，他不仅为其设宴饯别，而且还很诚恳地一再要求周纪善不要忘记“忠言频寄，以匡其不逮”。他于盛夏得到南方的佳果荔枝，分赠给周府教授王翰，使王翰大为感动，作诗以示感激之情：

“门山岁岁献时外，飞舸凌波不动尘，露颗摘来方盛夏，风花开处正芳春。浓合异味真堪贡，远带余香足可珍，金殿翠盘方进罢，分尝何幸到愚臣。”

再次，他看重友情。他与河南左布政使李昌祺的友谊，足以传为佳话。洪熙元年，李昌祺任河南左布政使。他为官宽惠和平，清廉自励，与朱有燬一样，喜欢牡丹。每年周王府中花开富贵之际，朱有燬都会邀请李昌祺参加赏花之宴，两人即席挥毫，吟诗作画，非常惬意。后来，朱有燬过世了，白了头发的李昌祺，展读朱有燬当年赠给他的牡丹图，睹物思人，想起往年两人每到花季时，总是一同赋诗题画和听歌赏花，以及朱有燬将他引为知己，送他许多牡丹花的往事，于是悲从中来，老泪滂沱地写了多首《题牡丹图》诗，现录其中一首：“平生同有爱花心，每到开时辄共吟。垂老凄凉空见画，人间何处觅知音？”足见他们之间情谊的深厚。

更难能可贵的是，朱有燬有一种关心下层劳动者疾苦的人间情怀。农民收麦子，遇阴雨连天，他就写[南曲柳摇金叹农夫]，希望西风赶紧“先把满天云送”。能关心下层人民的疾苦，这对一个藩王来说，确实不易。

英宗正统四年（1439），六十一岁的周宪王朱有燬走完了人生最后一步，于五月二十七日带着对人世的留恋离开了世间，葬于开封府城西南，枣林庄。

> 朱有燬好古嗜学，潜心文艺，他的杂剧作品在我国戏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 他不仅是一位多产的剧作家，而且他是以北曲杂剧创作作为终身使命的最后一位剧作家。从他二十六岁完成的第一种杂剧《张天师明断辰钩月》起，笔耕不辍，终身努力写作杂剧，共三十一种。至到去世的当年，六十一岁时还完成最后二种杂剧《河嵩神灵芝庆寿》和《南极星度脱海棠仙》，可以说他的一生是与杂剧创作联系在一起的。他的杂剧不管是从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鲜明的显示出元杂剧的遗韵。并且在他生活的时代，北曲杂剧已日趋衰落，案头化的倾向越来越严重，但朱有燬在接受金元杂剧优秀传统薰陶的同时，大胆借鉴宋元南戏表演上的一些长处，对杂剧日渐僵化的形式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使其增强了艺术活力，舞台生命得到延续。近代曲学大师吴梅赞誉朱有燬“气魄才力，亦不亚于关汉卿矣”。郑振铎称他为“伟大的作家”。他是最后一位北曲大家。在他之后，北曲作家虽不乏其人，象康海、王九思、徐渭等，但无人能象朱有燬这样，写下如此丰富多彩、艺术水平精湛的传世之作，也无人能象朱有燬这样如此执着地将北曲杂剧的创作与自己的生命相始终，也无人能象朱有

燬这样再次将北曲杂剧发扬广大，使北曲杂剧的舞台生命得以延续。从这个意义上说，称朱有燬为最后一位北曲大家是当之无愧的。

厦门大学图书馆